

# 浅析疫情对中国流动人口的影响

李灿辉 (北京大学 元培学院)

2023 年 1 月 2 日

## 摘 要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现有文献和数据资料，简要论述了新冠疫情对中国的流动人口产生的影响，并展望了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潜力。

**关键词：**疫情、人口流动、失业、用工荒

## 1 引言和研究背景

2020 年初开始的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各国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2 年 12 月底，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至少已造成了六百余万人的死亡（数据来源：网易新闻）。今天的世界总体上已经进入了“后疫情时代”。疫情给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各地区不同的应对策略也带来了不同的影响。

中国在疫情初期采取大规模封控的方式，有效遏制了病毒传播，保护了人民的生命健康，在短期内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新冠疫情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流动人口作为中国城市建设的主力军，成为了受到疫情影响最显著的群体之一。疫情前，中国的人口流动模式和劳动力市场处于转型阶段，户籍制度改革，城市流动人口保护政策正在不断推进。疫情的突然爆发和大规模封城，一方面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受到剧烈冲击，农民工失业率短期内大幅上升，劳动力需求下降和劳动力短缺共存；另一方面，疫情造成的“返乡难”，“复工难”和不确定性既造成了流动人口短期内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也打击了流动人口复工复产的信心。

流动人口作为城市化建设的主力军和“新市民”的主要来源，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有利于了解中国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

的新形势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也利于对城市流动人口这一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政策保护。已有不少研究借助人口流动大数据讨论了疫情防控对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杨冕等，2020；谭远发等，2021；全睿劼，2021），同时，一些基于实地调查和问卷的实证研究（郭双燕，2021；王礼贤等，2020）也关注了疫情下流动人口复工存在的具体问题；更多文献则聚焦于农民工失业问题和企业的用工荒并存的社会现象（杨胜利等，2021；臧微，2022；张蔚文等，2020）以及相应的政策应对（王震，2020；唐羚，2022）。

本文综合了一些现有数据和研究文献，探讨了已有研究文献的主要研究方向，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简单分析了疫情对中国流动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探究了疫情下农民工失业问题和企业“用工荒”并存的原因，最后总结了部分已有的政策保障，并展望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潜力和研究价值。

## 2 疫情前中国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 2.1 疫情前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模式

人口流动是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推动力之一，也是中国劳动力供给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前几十年内中国人口流动呈现出流动规模巨大且日益增长，以省内近距离流动和乡城流动为主，跨省流动和城城流动规模日益上升，人口以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为主等稳定特征（周皓，2021）。周晓津（2020）基于大数据的研究，得出了七普前一段时期内中国人口流动的基本模式相比于过去并没有显著变化，只是继续保持了流动总量快速增长和远距离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增长速度平稳下降的原有变化趋势等结论。

### 2.2 疫情前的流动人口与劳动力市场

#### 2.2.1 流动人口的就业情况

流动人口的就业是流动人口与劳动力市场发生关系的最直接途径，同时，流动人口的就业也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重要途径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宋全成等（2021）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得出，疫情前流动人口劳动参与率处于较高水平，所从事的行业以第三产业中的低技术含量行业为主，劳动形式主要是雇员和自营服务业。刘涛等（2021）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关注了流动人口就业质量的相关影响因素，认为教育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有显著正向作用。

2.2.2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用工荒

21 世纪前二十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影响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提早进入了人口增长放缓甚至开始负增长的阶段。根据“七普”数据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中国劳动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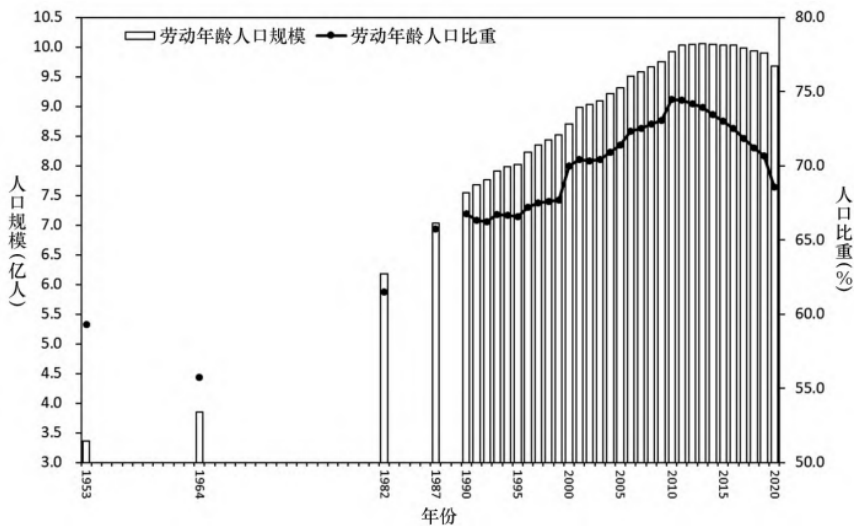


Figure 1: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重（图表来源：黄凡, 段成荣.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龄人口的比重和绝对数量均已进入下降期，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显示，中国的名义人口抚养比从 2010 年左右即开始上升 (如图 2)，黄凡等（2022）和童玉芬等（2021）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实际就业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数在 2015-2017 年左右即已开始下降 (如图 1)，中国以劳动年龄人口衡量的“狭义人口红利”业已结束。

在此背景下，人口的城乡流动，即主要是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的流动，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蔡昉（2022）和王亚楠等（2020）根据刘易斯理论的分析认为，中国人口转变的刘易斯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中国已经开始出现劳动力人口回流现象，劳动力继续向城市转移的潜力极其有限，城市劳动力短缺现象仍将长期存在。从大约 2010 年以来，中国到达了“刘易斯第二阶段”，同时 2017 年后，劳动力年龄人口开始下降，劳动力的无限供给阶段就宣告了尾声（蔡昉，2022），全国普遍出现“用工荒”现象，关于这一现象的成因，学界已做过充分的研究。一系列文献已从经济学和社会福利制度，信息不对称等多种角度进行过分析探讨（郑秉文，2010；武康平等，2020；张春龙等，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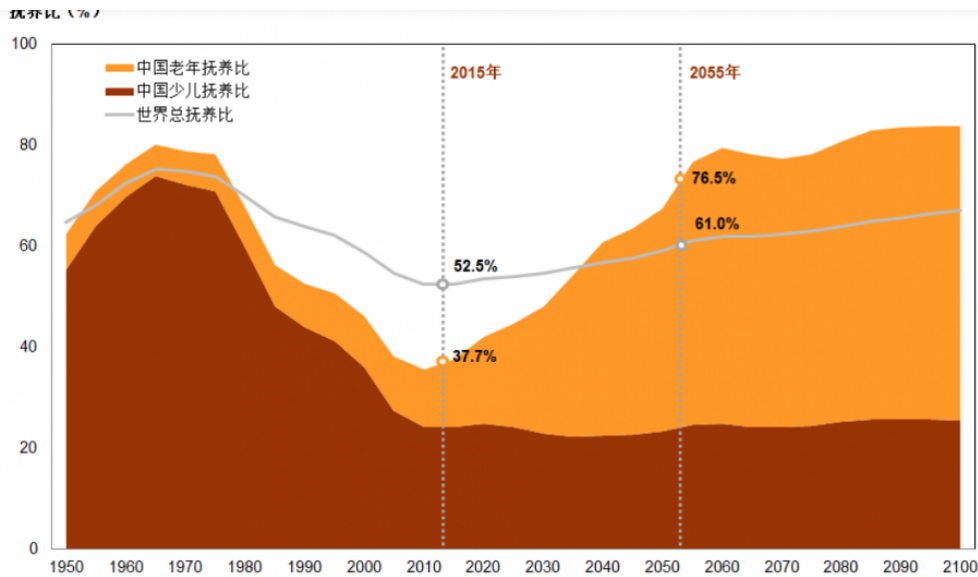


Figure 2: 中国人口抚养比曲线（图表来源：《世界人口展望》）

## 2.3 疫情下流动人口的脆弱性

流动人口作为在新冠疫情期间较为脆弱的群体，其抵抗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差，郭双燕（2021）利用田野研究方法调查了湖南一个村落的流动人口在新冠疫情期间受到的冲击，认为疫情时代的流动人口同时面临返乡和复工两个方面的困难，因此具有“脆弱性”，并

因此产生了“延续性”的敏感心理，这种心理也成为了疫情后“复工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疫情期间，流动人口面临着多方面的风险，一方面，疫情期间紧急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概率高于过去，流动人口生活工作稳定性受到冲击的风险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由于往往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居所，同时往往需要利用工作收入供养家庭（姜春云，2022），偿还贷款等，因此短期停工造成的生活压力往往会导致流动人口留城意愿下降或者寻找其他工作以期临时糊口，这也使其生活质量普遍发生了下降。

另一方面，对于乡——城流动人口而言，在城市中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更大，新冠病毒在大城市中的传播风险远高于小城市和乡镇，病毒传播率与城市规模呈现超线性关系（许刚等，2022），城市流动人口在健康方面也表现出了较高的脆弱性。

## 3 基本概念

1, 流动人口：指人户分离人口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

2, 脆弱性: 在收入和健康方面, 脆弱性是指家庭或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经历收入或健康贫困的风险。但脆弱性也意味着有可能面临一些其他风险(暴力、犯罪、自然灾害等)。

3, 后疫情时代: 新冠疫情过去后的时代

4, 第一轮新冠疫情: 主要指从 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4 月 8 日前后中国国内的新冠疫情

5,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买卖或流通的领域。

6, 劳动力供给: 在一定的市场工资率的条件下, 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家庭或个人)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劳动时间。

7, 人口红利: 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 抚养率比较低, 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8, 人口回流: 一个地区的外流人口重新向该地区流动。

## 4 疫情对中国流动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当前关于疫情和流动人口相互关系的研究资料, 大多关注流动人口对疫情防控的影响和疫情下流动人口的管理问题。由于数据不足, 疫情发生时间点较近, 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流动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研究文献较少。

关于目前流动人口的研究, 已有的数据来源相对较少, 目前文献中较为常用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两种: 一是手机定位数据和百度地图迁移数据, 搜索数据等(杨冕等, 2020; 全睿劼, 2021; 詹庆明, 2022), 主要利用了流动人口在不同地区间的迁移频率及其空间密度结构; 一是通过抽样调查, 问卷调查, 田野研究等方式实现的实证研究(邓蓉, 2021; 王礼贤, 2020; 邵盼盼等, 2021)。

### 4.1 疫情对中国国内短期人口迁徙和长期人口流动总体规模的影响

杨冕, 谢泽宇 (2020) 利用百度地图迁移大数据研究了 2020 年疫情开始到复工复产后人口迁徙规模的显著变化。笔者搜索了 2021, 2022 年的数据, 数据显示出 2020 年疫情后短期内, 由于严厉的封控措施, 人口迁徙规模大幅下降, 在之后的 2021, 2022 年, 这个数据发生了回升, 其中 2022 年春运的人口迁徙指数已经回升到 2019 年的水平, 但是全年流动指数较为平稳, 几个地区的大规模疫情封控解除后也没有像 2021 年一样出现人口迁移“高峰”。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新冠疫情对人口流动的影响逐渐由短期影响向长期转变, 人口迁徙的意愿和潜力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长期性下跌。谭远发, 朱春霞

---

(2021) 利用已有的数据源分析了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人口迁移的影响并总结了相关研究成果, 认为疫情对各国国内人口流动规模的影响主要依赖于该国疫情严重程度和防疫政策, 而对国际人口流动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 4.2 疫情对中国大城市群人口流动的影响

除了全国整体的人口流动情况, 中国的几大都市圈内部的人口流动情况同样具有单独研究的价值。一方面, 大城市群内部城镇化率较高, 人口近距离城——城流动占比较高, 人口流动具有网格化, 中心化等结构特征, 方便调查统计。另一方面, 大城市群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张车伟, 王智勇 (2015) 根据 Zipf 律, 利用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数据探讨了中国人口的合理分布和城镇化发展模式, 认为中国城市人口分布模式偏离最合理分布的部分主要是特大城市数量和规模不足, 难以发挥次级集聚效应, 而影响特大城市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劳动力人口流动性不足, 因此, 大城市群内的人口流动对于中国人口经济的影响更为突出。

一系列关于中国两大都市圈——粤港澳大湾区及延伸出来的深圳都市圈, 长三角地区, 以及对美国旧金山大湾区的研究中, 共同以利用手机定位获取的位置大数据作为主要数据来源 (全睿劼, 2021; 詹庆明等, 2022; 钟雷洋等, 2021)。这一数据来源具有精度高, 成本低, 即时性强的特点。这些研究显示, 疫情开始后的短期内, 深圳都市圈人口大规模流出, 同时在居家禁令实施后, 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的流动指数均迅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关于第一轮疫情后 (主要指 2020 年四月以后) 的影响, 文章指出, 疫情期间深圳都市圈的各人口流入地意愿迁徙系数相比疫情前均发生下降, 人口流动率基本成比例变化。詹庆明等 (2022) 的研究发现, 长三角的人口流动指数呈现先升后降后升的“V”字形, 恢复程度和疫情得到控制的程度显著正相关, 且疫情后反而高于疫情前, 说明相比于该地区迅速发展的经济, 疫情对于长三角地区人口流动规模的破坏是有限的, 同时疫情改变了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的网络结构, 疫情后, 长三角城际人口流动在各省的密度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如图 3), 对中间节点的依赖程度显著下降, 人口流动模式向多节点网状模式转变, 并

且由于疫情期间省际流动难度加大, 长三角的城市群产生了明显的和向中心城市流动并行的分子群流动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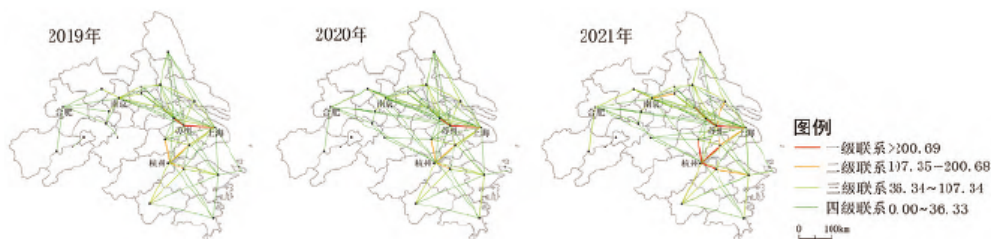


Figure 3: 2019-2021 年长三角城市群人口联系密度空间分布（图表来源：詹庆明等，2022.COVID-19 疫情前后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结构变化研究）

### 4.3 疫情下的人口回流

关于疫情前中国人口回流的研究，已有一系列从回流的规模，方向，空间结构差异和影响因素等角度做出的研究 (李志刚等，2020；刘达等，2021)。但是对于疫情后的人口回流情况，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验证因疫情回流的人口是否会重新回到城市等命题，故虽然许多新闻报道都认为疫情造成了流动人口回流规模的急剧扩大，笔者并没有找到足够的论文和数据支撑之，关于疫情后的人口回流现象，仍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 5 失业和用工荒并存——疫情下流动人口就业形势

### 5.1 疫情下的失业

新冠疫情以来，全世界失业率普遍上升，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高文书 (2020) 的测算认为，新冠疫情在 2020 年一季度造成了 8400 万个就业岗位损失，2300 万个全年就业岗位损失。关于疫情下的失业，特别是农民工失业的问题，已有大量研究 (王震,2020；邓蓉等，2021；刘学良等，2021；屈小博等，2020；唐羚，2022；王礼贤，2020) 分别从不同地域，不同群体，不同行业的失业和相应的政策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疫情下的失业，具有原因的多样性，个体差异性明显等特征。

关于疫情下的失业问题，已有的研究主要采取来自官方机构的调查数据，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测算分析。数据包括短期和长期内的表观失业率，各行业受疫情影响造成的失业率等；问卷调查涵盖了各行业返工复产意愿和比例，不同被调查对象的学历，家庭与复工存在的障碍等。

### 5.1.1 疫情下失业的多重原因

#### 1) 周期性失业

疫情前世界经济即已处于下行阶段，疫情更加重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下行和周期性失业，根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2022 年全球失业率将高达 5.7%，由于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的冲击，一些企业的倒闭造成了大范围的周期性失业，这种周期性失业一般被认为是疫情下长期失业的主导因素（如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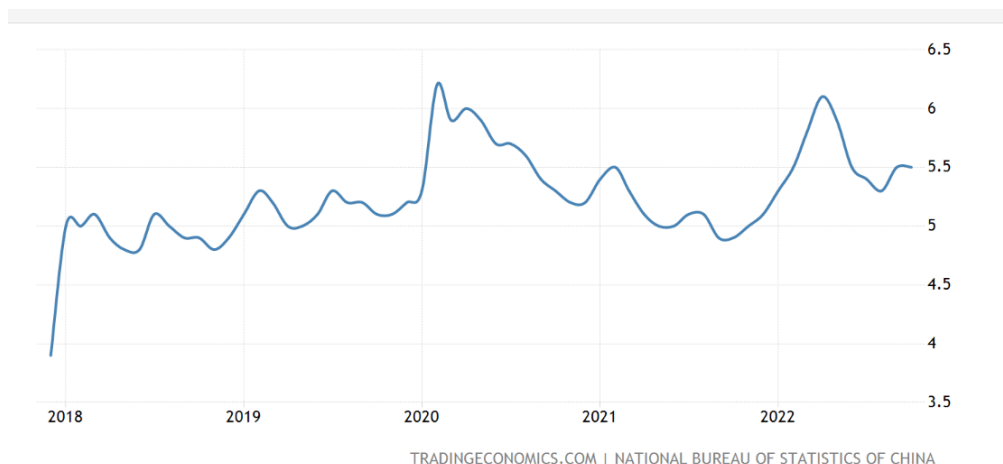


Figure 4: 中国失业率变化测算曲线（图表来源：traydingeconomics.com）

#### 2) 结构性失业

疫情影响了中国的产业结构，疫情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的第三产业 GDP 占比在 2019 年就已经达到了 53.9%，2021 年却下降到 53.3%，为 2010 年以来首次下降。由于疫情封控对服务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冲击显著高于其他产业（如图 5），同时这两个产业又集聚了中国大部分的劳动人口，因此，疫情对产业结构的冲击造成了显著的结构性失业。

#### 3) 隐藏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

邓蓉等（2021）以成都市为例，利用多种统计数据和实证研究方法研究了农民工隐性失业的表现形式。农民工隐性失业主要表现为延期复工造成待业，产能和需求下降造成的劳动力复工后“有职无工”，以及因此造成的劳动收入下降和裁员，工作更换过程中技能学习阶段的摩擦性失业等。王礼贤等（2020）利用滚雪球抽样法对疫情下流动人口的复工意愿的研究和郭双燕（2021）对返乡流动人口的访谈研究都认为，感染新冠和遭遇封控的风险以及流动人口的焦虑感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作为流动人口自身方面的原因同样降低了他们的复工意愿，造成了待业型的失业。



表1 不同行业就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变化(%)

	2月下旬		3月下旬		4月下旬	
	正常上班	等待复工	正常上班	等待复工	正常上班	等待复工
农林牧渔业	26.2	9.8	67.2	3.3		3.0
采矿业	41.7	25.0	73.1	3.9	66.7	10.0
制造业	51.3	31.9	79.9	8.9	89.1	0.9
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48.2	22.2	85.4	4.2	84.1	3.3
建筑业	23.5	43.4	59.1	18.7	79.8	3.9
批发和零售业	33.0	22.8	64.5	7.9	69.3	2.7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	51.7	18.8	71.2	6.4	80.6	1.3
住宿和餐饮业	24.5	39.6	45.0	19.9	59.1	7.0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36.3	12.3	60.5	7.1	75.5	0.8
金融业	29.7	6.1	67.2	4.8	74.3	2.9
房地产业	43.9	19.5	69.2	5.3	77.8	2.8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8.4	22.9	69.3	5.3	60.5	3.7
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	16.9	7.7	63.8	3.8	73.5	1.7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51.3	18.0	79.0	10.5	93.2	2.3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49.4	21.7	61.3	9.8	79.1	4.1
教育业	10.0	21.0	11.9	15.4	35.1	10.7
卫生和社会工作	65.6	9.2	83.0	6.1	88.3	2.7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6	21.7	43.3	15.4	56.4	3.2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国际组织	67.3	4.3	84.0	2.5	92.5	0.8

注：除了正常上班和等待复工之外，其他状态包括灵活上班、正在找工作、自由职业等。

数据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民生课题组“抗疫情、保民生”在线监测调查。

Figure 5: 各行业就业人员工作状态（图表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 4) 暂时性待业向长期失业转变

新冠疫情发生后，人口复工率短期内呈现出“V”字型转变（屈小博等，2020），体现出新冠肺炎造成的失业主要还是暂时性的失业，但是这篇文章中的数据同样表明，即使到了第一轮疫情基本结束的四月后，仍然存在很大比例人员没有复工，由于上文提到的新冠疫情下失业原因的多样性，这部分待业人员很大程度上面临着短暂失业转向长期失业的风险，同时，已经复工的人员同样有很大一部分处于隐藏性失业状态，面临着被裁员成为失业人口的风险。

#### 5.1.2 疫情下的农民工失业

农民工群体是流动人口的“主力军”，相比于城城流动人口和本地居民，这一群体具有流动性强，劳动技能普遍低下，受疫情波及失业严重，抵御影响能力弱的特征，因此在疫情造成的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杨胜利，邵盼盼 [34] 通过对农民工流入流出大省进行的抽样调查，研究了疫情下农民工的失业特征，该研究表明，通过熟人关系就业，无劳动合同，学历较低，向省内或较小型的城市流动，工龄较短等因素均和农民工失业率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

与其他流动人口相比，疫情下农民工的失业呈现两个特征：一是短期内由于生产消费停滞，受到的影响最剧烈（屈小博、程杰，2020）；一是城乡流动成本和疫情后就业结构改变，复工再就业难度较大（张桂文，2020）。

---

关于农民工失业问题的研究，由于失业具有多重性，难以用简单的数据标准进行普遍衡量，故研究者主要采取了来自各地方政府的统计报告数据和小规模抽样调查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

## 5.2 复工复产下的“用工荒”

进入复工复产阶段以来，许多企业无法顺利召回原有工人，因此导致了大量产能闲置，与原本就存在的用工荒相比，这一次用工荒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体现在多个方面：

- 1) 疫情风险导致流动人口留城意愿降低，流动人口向乡村回流（王礼贤等，2020）
- 2) 停工期间部分流动人口为维持生计，寻找了其他就业岗位，因此导致了劳动力供需结构的重新配置，造成了摩擦性的失业和劳动力供给不足。

3) 不同地区间疫情情况不同，人口流动受限，一些地区农民工不能及时返回复工除此之外，劳动力市场同样存在就业不充分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由于线上办公对和服务业市场需求不旺盛，实际复工人员不能实现充分完成劳动，劳动生产率下降，导致短期内劳动力在社会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合理，实际劳动力供给不足更加严重。

## 5.3 疫情下劳动力市场变化和人口流动的相互关系

疫情影响下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疫情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和停工停产是短期内造成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结构转型也是城市农民工失业和流动人口问题的一大产生背景。张蔚文等（2020）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研究了疫情下的用工荒的成因和相关政策，认为地方政府缓解疫情下用工荒的短期政策无法真正解决用工荒问题，必须利用更有效的手段实现农业转移人口“进得来，留得下”。

## 5.4 疫情下流动人口失业问题的政策保障

面临着新冠肺炎常态化防控的背景和疫情下失业问题的突出，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到，要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已有不少文章（高文书，2020；刘学良等，2021；屈小博等，2020；唐羚，2022）研究过此背景下解决就业问题需要的相应政策保障，国务院也发布了一系列文件，要求落实就业优先政策，减轻企业负担，完善劳动保障制度，积极组织引导农民工有序就业，强化失业人员社会保障和临时就业援助等措施，以期减轻短期内疫情造成的失业问题。另外，长期来看，解决失业问题和用工荒，都需要更有效的政策帮助流

---

动人口成功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和劳动人口技能培训，实现劳动力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流动人口的充分就业（张蔚文等，2020）。

## 6 总结和展望

关于疫情期间人口流动和劳动力市场变化的研究，目前主要围绕着疫情初期和复产复工阶段人口的流动规模，疫情下农民工和流动人口面临的失业问题及其政策保障，以及疫情下劳动力市场的用工荒等方面进行。总的来说，疫情显著抑制了中国的人口流动，对中国的人口流量产生了短期的冲击和长期的影响，同时疫情加剧了企业的用工荒和城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失业风险，对整体经济和个人生活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面对疫情造成的这一系列问题，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稳就业，保障疫情下弱势群体基本生活，推动产业转型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合理配置。

由于疫情的开始时间距今天较近，关于疫情后期流动人口问题以及关于疫情后城市恢复实际情况的研究尚显不足，例如关于疫情下的人口回流，相比社会和媒体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是否可逆，流动人口回流会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造成什么样的新变化等问题的关注，相关的已发表的调查研究成果较少。另外，关于后疫情时代人口流动中的结构性变化，例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迁移比例，流动人口在不同规模城市中的比例等的变化等问题，国外已有大量的相关研究，通过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研究方法，结合中国实际，这些领域仍有较大的研究潜力。

---

## 参考文献

- [1]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Z]
- [2] 周皓. 中国人口流动模式的稳定性及启示——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数据的思考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1,(03)
- [3] 周晓津. 基于大数据的人口流动流量、流向新变化研究 [M] 经济管理出版社,2020
- [4]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人口司. 《世界人口展望》，2017
- [5] 黄凡, 段成荣.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质量红利——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J]. 人口与发展.2022,28(01)
- [6] 童玉芬, 刘志丽, 宫倩楠. 从七普数据看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变动 [J]. 人口研究.2021,45(03)
- [7] 王立军, 马文秀. 人口老龄化与中国劳动力供给变迁 [J]. 中国人口科学. 2012,(06)
- [8] 蔡昉. 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标识性变化 [J]. 经济研究. 2022,57(01)
- [9] 王亚楠, 向晶, 钟甫宁. 劳动力回流、老龄化与“刘易斯转折点” [J]. 农业经济问题. 2020,(12)
- [10] 杨冕, 谢泽宇.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中国人口流动的影响——基于百度地图迁徙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J]. 人口研究. 2020,44(04)
- [11] 谭远发, 朱春霞. 新冠肺炎疫情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回顾与展望 [J]. 西北人口. 2021,42(04)
- [12] 李雅楠. 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与社会融合 [M] 出版社
- [13] 郭双燕. 脆弱性与延续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流动人口研究——基于湖南 Y 村的实证调研 [J]. 桂海论丛. 2021,37(04)
- [14] 姜春云. 家庭化迁移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 CMDS2017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兰州学刊
- [15] 许刚, 焦利民, 李新虎, 肖逸雄, 宫鹏, 龚健雅.COVID-19 病例与城市人口规模的标度律及其时间演化 [J]. 地理学报

- 
- [16] 程多闻. 新冠疫情冲击下国际劳工移民与发展关系的变化 [J]. 国际关系研究. 2021,(06)
- [17] 段成荣, 谢东虹, 王涵, 吕利丹. 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看国际人口迁移: 三论人口迁移转变 [J]. 人口研究. 2020,44(05)
- [18] 上官小红. 疫情防控与边境管理: 西南地区跨国人口流动的现状与挑战 [J]. 八桂侨刊. 2022,(03)
- [19] 张车伟、王智勇. 中国人口合理分布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协调发展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 [20] 全睿劼. 疫情对深圳都市圈人口流动影响的研究 [C]. 成都: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21
- [21] 詹庆明, 张伟杰, 袁晓妍. COVID-19 疫情前后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流动结构变化研究 [J]. 地理信息世界. 2022,29(02)
- [22] 钟雷洋, 周颖, 高松, 夏吉喆, 李珍, 李晓明, 乐阳, 李清泉. 新冠疫情影响下的人口流动模式变化识别—基于手机定位大数据的中美两大湾区对比分析 [J]. 武汉大学学报 (信息科学版)
- [23] 李志刚, 刘达, 林赛南.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回流”研究进展与述评 [J]. 人文地理. 2020,35(01)
- [24] 刘达, 郭炎, 栾晓帆, 李志刚. 中部大城市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武汉市为例 [J]. 地理研究. 2021,40(08)
- [25] 童昀, 马勇, 刘海猛. COVID-19 疫情对中国城市人口迁徙的短期影响及城市恢复力评价 [J]. 地理学报. 2020,75(11)
- [26] 高文书.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及其应对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20,(03)
- [27] 王震.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就业保护与社会保障 [J]. 经济纵横. 2020,(03)
- [28] 邓蓉, 胡雯, 吴丹, 章敏. 后疫情时代农民工隐性失业对农村经济社会影响研究——以成都市实证调查为例 [J].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21,(04)

- 
- [29] 刘学良, 宋炳妮.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失业情况、失业率修正及就业保障 [J].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2021,35(04)
- [30] 屈小博, 程杰. 新冠肺炎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政策反应 [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43(04)
- [31] 唐羚. 后疫情时期江苏省流动人口就业质量提升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22,21(12)
- [32] 王礼贤, 姜茂敏, 严运楼, 于海燕.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下流动人口复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J]. 医学与社会. 2020,33(11)
- [33] 杨胜利, 邵盼盼. 疫情冲击下农民工失业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J]. 西北人口. 2021,42(05)
- [34] 臧微. 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超大城市流动人口失业风险研究 [J]. 城市发展研究. 2022,29(03)
- [35] 郑秉文. 如何从经济学角度看待“用工荒” [J]. 经济学动态. 2010,(03)
- [36] 武康平, 田欣. 信息不对称与供求失衡下的“用工荒” [J]. 经济学报. 2020,7(02)
- [37] 张春龙, 张卫. 当前“用工荒”: 人口结构改变和经济结构转型的预警 [J]. 现代经济探讨. 2015,(06)
- [38] 张蔚文, 卓何佳, 董照樱子. 新冠疫情背景下的用工荒: 基于人口流动与复工复产政策的考察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30(06)
- [39] 李春玲. 疫情冲击下的大学生就业: 就业压力、心理压力与就业选择变化 [J]. 教育研究, 2020,41(07)
- [40] 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2000/2001》
- [41] 宋全成, 甘月童. 劳动年龄流动人口就业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J]. 社会科学辑刊. 2021,(04)
- [42] 刘涛, 王德政. 教育水平、工作经验与流动人口就业质量 [J]. 人口研究. 2021,45(04)
- [43] 张桂文, 吴桐.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0 (3): 11-20